

## 皇命與主命之間： 耶穌會士湯若望關於明清鼎革的歷史書寫

陳靜怡\*

**摘要** 作為在耶穌會與明清兩朝中均享有特殊地位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的身份極具複雜性，他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現出熱忱傳教者、務實科學家等截然不同的歷史面相。《歷史敘述》(*Historica Narratio*) 是湯若望於1665年出版的歷史記述。此書從湯若望的第一主視角出發，記錄了湯若望從抵華後到1661年順治帝駕崩期間在中國傳教、交友、生活的經歷。本文旨在立足於這一手史料，主要着眼於湯若望對明清鼎革的描寫，追索其歷史敘述背後的個人心路與自我定位，解讀湯若望的多重社會身份對此歷史敘述的形成、傳播與出版的影響。

**關鍵詞** 明清易代；湯若望；傳教士文獻

### 引言

1644年，統治中國二百七十餘年的明帝國陷入崩潰，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在李自成的大順軍隊倉皇撤回關中後，清政權定鼎北京，建立起新的統治。這一來自東北地區的政權雖然早在八年前便已初步形成，但與地方之間的過渡戰爭一直延續到1683年。在這場持續了四十餘年的社會動蕩之中，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們始終居於一個特殊的位置，他們需要在無法與歐洲取得實時聯繫及獲得有力保護的情況下，在不同政權的更迭之間存身立命，並作出是否承認某一政權並向其效忠的重要決定。

在諸多來華傳教士中，湯若望（常作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拉丁語拼寫作Joannis Adami Schall）作為唯一留守北京的耶穌會領導人，親眼目睹了明王朝的崩潰、大順的旋生旋滅與清軍的最終勝利。曾受明廷重用的湯若望最終效力於清廷的決定，恰是一

眾曾服務於明王朝後又轉向清廷的傳教士抉擇的縮影。

《歷史敘述》是湯若望於1665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出版的回憶性筆記，此書以耶穌會中國教史為題，囊括了大量關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記述。該書從湯若望的第一主視角出發，主要記敘他從抵華開始到1661年順治帝駕崩期間，在中國傳教、交友、生活的經歷。可惜的是，《歷史敘述》目前僅有拉丁文和德文兩語文本，也尚未得到中國研究者的專門討論。本文旨在立足於這一手史料，整理湯若望在明清易代前後的經歷，結合學者的相關傳記與研究著作進行佐證，以解讀其歷史敘述背後的個人心路，以及湯若望的多重社會身份對此歷史敘述的形成、傳播與出版的影響。<sup>1</sup>

### 一、湯若望生平的爭議性與史料溯源的意義

魏若望(John Witek)教授指出，湯若望在華的經歷充滿了矛盾：他先後為明、清兩朝工作，並在後者取得了比前者更高的位置；他的天主教信仰使他區別於兩朝主流知識分子，他為此屢遭懷疑和衝擊；同時，作為地區的負

\* 陳靜怡，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中西文化交流史。



圖 1. 湯若望肖像版畫，載阿塔納修斯·基歇爾 (Athanasius Kircher) 編著《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1667 年。(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via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ss:550025>.)

責人，湯若望的言行並不完全使他的會士弟兄們信服，大量控訴其行為的信件足以證明這一點，然而這些教士又無法脫離湯若望的政治地位所提供的庇護。<sup>2</sup> 這種矛盾使得湯若望在不同的研究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歷史形象——基於湯若望個人經歷的研究往往指向他傳教的熱情，而在考察他的天文曆算作品以及着眼於整體傳教士群體的研究中，他卻經常以更加務實甚至功利的面貌出現。<sup>3</sup>

這些矛盾可以被視作是現有湯若望研究方向與材料上出現不同側重的結果：現有的

湯若望個人經歷研究，通常注重對其個體行為與成就的考察。而部分著作從作品出發、涉及其心理與動機，又往往過於強調湯若望作為留京耶穌會士的代表與卜彌格 (Michal Piotr Boym)、瞿安德 (一名紗微, Andreas Wolfgang Koffler, 又作 Andreas Xavier Koffler) 等南明會士之間，或是湯若望作為領導者與普通教士之間的地位、行為的對立性，從其他會士對傳教事業的純粹忠誠出發，將立場相異的湯若望視作是身負官方使命、重視政治因素而輕視傳教責任的代表，這無疑是對湯若望自身複雜性的一種忽視。

北京大學肖清和教授認為，傳教士作為站在東西方交匯點上的“中間人”，自然具有多重身份，使得他們在不同的社會語境與史學研究中呈現出不同的面相。湯若望在耶穌會與明清兩朝中的地位使他具備了科學家官員、宗教傳教士、迷信活動者三種面相，且這三種面相都表現得極為突出。<sup>4</sup> 考慮到湯若望自身經歷的複雜性，若我們在研究中將其本人視角與他者視角進行相互對照，必能對他的自我認知與定位作出更完整的究源與解讀。

在回顧《歷史敘述》的出版之前，筆者需要先介紹湯若望的一份回憶錄。這份回憶錄的寫作約止於 1661 年，後由湯若望的助手白乃心 (Johann Grueber, 也作 Jean Grueber) 於 1664 年帶至羅馬。<sup>5</sup> 考慮到白乃心於 1661 年 4 月或 6 月與比利時耶穌會士吳爾鐸 (Albert d'Orville) 自西安出發赴歐，湯若望的寫作時間應不會晚於此時。<sup>6</sup> 這份回憶錄應有 20 章，但現存於羅馬的回憶錄文稿在第 16 章中斷。<sup>7</sup> 魏特 (Alfons Vāth) 認為這份回憶錄是《歷史敘述》的來源，至於回憶錄未完的部分，則從湯若望的信件中取材補充。<sup>8</sup> 卡洛斯·索默沃熱爾 (Carlos Sommervogel) 認為《歷史敘述》的編輯者是約翰內斯·弗雷西 (Johannes Foresi) 神父。<sup>9</sup> 約瑟夫·杜爾 (Joseph Duhr) 也認為弗雷西神父可能是此書的編輯者，因為他手中有湯若望回憶錄的手寫稿。<sup>10</sup> 魏特沒有表明他對編輯者的猜測，但

## 傳教佈道

他批評《歷史敘述》的編輯者改變了湯若望回憶錄原本經典簡約的敘述風格，並刪除了一些細節，將其改編成缺少個體特色的客觀歷史作品，導致《歷史敘述》作為傳記學與歷史親歷者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受到極大損害。<sup>11</sup>《歷史敘述》最初於1665年由歐洲耶穌會在奧地利維也納出版，1672年更名*Historica Relatio*（下稱《歷史報導》）後在德國雷根斯堡重新出版。<sup>12</sup>1672年本在基本保留1665年原文的基礎上，於湯若望正文後增加了1581至1669年的在華傳教士大事記、曆獄前後神蹟目錄、一份曆獄中受審的天主教各修會教士（包括耶穌會、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名單，以及長達28頁的關鍵信息索引目錄。1581至1669年在華傳教士的相關敘述，由親歷曆獄後自中國返回羅馬匯報教務的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書中落款作Prosperus Intorcetta）於1671年4月14日在羅馬撰寫。<sup>13</sup>除此之外，1672年本也修正了1665年本的部分拼寫錯誤（如第18章中將“uniformiter”錯印為“uniformaliter”，第21章中將前綴“per”錯印為“præ”），還對版式進行了一系列修改：前言和正文被重新排版，初版正文末的耶穌會座右銘被移至殷鐸澤補文末，並更改了部分字體與書中插圖的順序。然而，1672年本也出現了在目錄中將第24章標為第14章的紕漏。考慮到湯若望本人已在1665年下獄，並於次年病逝，故1672年本中的改動應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sup>14</sup>德語版的《歷史敘述》於1834年在維也納出版，由曼塞克（Ig. Sch. von Mannsegg）翻譯為德語文本。德語本對原書內容進行了一定的壓縮合併，該本將正文部分從原有的25章改為了23章，並增添了一部分註釋，李雪濤在《誤解的對話：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中使用的文本，即為此壓縮內容後的德譯本。<sup>15</sup>魏特指出，曼塞克對原文內容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曼塞克曾將作品中以湯若望口吻進行的自我介紹，錯誤理解為湯若望本人來到維也納向皇帝進行的自我介紹。<sup>16</sup>《歷史報導》則於1942年與湯若望其他書信一起，由裴化行（Henri Bernard）在天津編輯出版了法語譯本，魏若望在〈湯若

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一文中使用的湯若望本人的記敘文本，則主要來自於此法語合譯本。<sup>17</sup>相比較而言，《歷史敘述》與《歷史報導》的拉丁文原始文本尚未在這些研究中受到充分重視。魏特在《湯若望傳》一書中提及湯若望紀年的相關材料時，曾評價此二書存在敘述模糊、片面的弊病，缺乏參考的可靠性，但他在正文的寫作中除了使用湯若望回憶錄的原本之外，仍大量參考了此二書的內容。<sup>18</sup>

從文本生成的角度看，《歷史敘述》是基於湯若望個人視角敘述、經由耶穌會編輯而成的作品。儘管此書的編輯受到一定批評，但正因如此，它的內容既與湯若望本人的心路歷程與價值傾向相關，同時也暗含當時歐洲耶穌會與耶穌會士對湯若望在華經歷與在華耶穌會工作的思考。此書所塑造的是湯若望與歐洲耶穌會共同希望塑造的湯若望形象與中國明清鼎革敘述模式。若以此書與相關傳記、論文等研究成果進行聯繫、對比，我們能夠更為充分地呈現出湯若望在教會內外、政權動蕩中面臨的種種矛盾、衝突及身份難題。因此，本文選取1665年初版的《歷史敘述》進行文本解析，以盡可能接近原始內容，減少耶穌會後期再編輯、整理所帶來的影響。

## 二、湯若望筆下的甲申之變

1643年末，李自成率領叛軍席卷山西，原有望補湯若望職位之缺的德國司鐸萬密克（Michel Walta）死於蒲州。<sup>19</sup>對戰亂的恐慌在耶穌會士間迅速蔓延，大量的北方傳教士開始南逃。當李自成於次年4月兵臨北京時，時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的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與華北教省省會長傅汎際（又作傅泛濟，Francisco Furtado）已避禍南下。為了保護《崇禎曆書》書版與北京教會，湯若望留在北京，直接目睹了明朝最後的崩潰。<sup>20</sup>

湯若望在作品之中毫不諱言對明朝滅亡的惋惜。他認為北京城的淪陷是內因與外因交互作用下的偶然結果，並不具有必然性。他記敘



道：宦官因為記恨崇禎帝剛上位時對閹黨的清理，向後者隱瞞了國內的緊迫局勢。他們的行為導致崇禎帝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取真實情報，因此也錯過了應對起義軍的最佳時機。<sup>21</sup> 其後，被賦予了守護城門這一重大責任的宦官臨陣倒戈，在明朝一方佔據了絕對火器優勢的情況下，主動為敵軍打開城門。<sup>22</sup> 在叛徒與敵軍的雙重壓力之下，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數月之前，正是在同一地點，他與親信宦官一同觀看了湯若望新鑄大炮的試射。<sup>23</sup>

作為北京城門上火炮鑄造改進工作的主持者，湯若望表現出對京城軍備的自信。在他的分析中，北京城已經具備了足夠的武器裝置，未必能被裝備惡劣的叛軍攻破。他強調，是宦官的背叛對明帝國構成了致命一擊。<sup>24</sup> 對於崇禎帝的失敗，湯若望不無惋惜。他在書中多次肯定這位皇帝的才幹、膽魄，以及對西方科技、知識開放的視野，提出天主教事業本有希望在崇禎帝的支持下取得新的進展。<sup>25</sup>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湯若望直接表現了對崇禎個人的讚譽，但他亦坦率地記述了明朝末年大量戰亂與社會衰敗的景象，且不諱言明廷整體的老朽。<sup>26</sup>

湯若望特別提及，崇禎帝的遺體在被發現後並未得到相應的尊重與同情，直到一個月後入城的清軍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他以此強調，滿人對明皇室表現出更大的崇敬，甚至超越了漢人。<sup>27</sup> 然而，湯若望記載的這一信息與中文文獻記載存在部分衝突。在中文記載中，清軍入城後確實為崇禎帝舉辦了喪禮，如《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5記：

攝政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諭故明官員、耆老、兵民曰……今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sup>28</sup>

然而，清廷舉辦的這一次葬禮並非是湯若望所說的“首次舉辦”——大順政權在發現其遺體後就安排了喪事，並非將其置之不理。如談遷《國權》記：“庚戌，先帝遺弓見于萬歲

山……辛亥，改殯大行帝后……”<sup>29</sup> 計六奇《明季北略》：“乙酉午刻，得先帝凶問，縊於煤山，乃以雙扉同昇母后二屍出，送至魏國公坊下。”<sup>30</sup> 《甲申核真略》中的記錄也十分詳細：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賊搜得先帝遺弓于後園山子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二十三日，殮先帝于東華門外。初用銀五兩，得二棺，與王承恩俱殮。旋用司禮王德化言，易以朱漆梓宮，與中宮梓宮同移佛菴中。命僧為誦經，諸人不得入。<sup>31</sup>

在清人所撰寫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編》中，也提及清軍入京後，多爾袞曾詢問崇禎葬儀，並在聽取降臣的敘述後，令官民為崇禎帝服喪三日，可見崇禎帝應在清軍入京前已得安葬。<sup>32</sup> 儘管在這些記載中，大順政權在京時為崇禎帝舉行的喪禮確實不如清廷隆重，但可以看出大順政權對崇禎帝的葬事是有所安排的，這與湯若望所記不符。湯若望在此處可能將清軍入京後命令官民為崇禎帝服喪一事，理解為清人為其主辦喪禮；亦有可能是為了通過對比來突出清政權，從而刻意隱去了大順政權舉辦的崇禎帝葬事。巧合的是，湯若望並非是藉崇禎帝身後事來貶低大順政權的唯一一位傳教士作者，衛匡國（Martino Martini）在《韃靼戰紀》中的描述更為誇張——他稱李自成命人將崇禎帝碎屍。<sup>33</sup>

若僅觀察湯若望所記錄的個人與大順官員的往來，不難發現他受到大順方面的禮遇，教會的財產也基本得以保全。但總體而言，他對大順政權的負面描寫遠遠多於正面的描寫——關於大順政權進京後的醜態和離開北京時的暴行的記述，佔據了描述的絕大部分。<sup>34</sup> 他記錄了這一時期自己救治鄰居、保護周邊的信徒與躲在會所之中的教友的經歷。<sup>35</sup> 若聯繫前文，這一時期的湯若望可能忙於保護周邊居民與教會財產，未能及時獲得崇禎帝葬事訊息。

相較於對大順政權入京的記述，清軍進入關內的行為在湯若望筆下顯得極具合法性與正

## 傳教佈道

義性：明朝將領吳三桂在被李自成以父親性命要挾時拒絕投降，為了進一步反抗李自成，他將希望寄託在清政權上。<sup>36</sup> 湯若望在記敘中強調清政權此前處於維護與明廷邊陲協議、不相侵犯的立場；在吳三桂求援之後，滿人因協議之中“協守邊疆”的條款以及對百姓的責任心而決意入關。<sup>37</sup> 這些描寫足見湯若望對清政權“得位之正”的竭力渲染。值得一提的是，魯日滿 (François de Rougemont)、帕萊福 (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 這兩位教士作者，雖然在對明清政權的評判態度上不盡相同，但就吳三桂引清軍入關的表態皆與湯若望相類，均強調清軍是受到明將委託後入關的。<sup>38</sup> 與這兩位作者不同的是，湯若望不僅強調了清軍入關的直接原因是明將的求援，更在此書開篇綜述國內全局時便向讀者介紹崇禎帝曾為鎮壓國內叛亂而召集滿人軍隊，又在其後說明崇禎帝與關外清軍所達成的和平協議之中，亦要求清軍協助明軍平定農民軍叛亂，因此強化了清軍拯救者的身份，使清軍與掀起國內叛亂的大順政權形成一正一反的鮮明對比，也使得清軍南下入關之舉被賦予信守承諾、繼承崇禎帝遺志的積極意義。由此，在幾位教士作者中，湯若望貢獻了對清軍南下最為正面的敘述。<sup>39</sup>

滿人的到來迅速改變了華北地區的局勢。多爾袞抓住時機進入北京。湯若望對此寫道，能夠結束亂局的清軍受到北京居民的歡迎。<sup>40</sup> 而在中文文獻中，關於清軍入城之初北京市民迎接的情況與原因，時人筆記中的記述差異頗大。如《定思小紀》中載：

次早，乃五月初一日也。耆老相率出郭外數十里迎視，見大軍擁一人至，導之入，將抵東華門，所司具鹵簿。一人者舍騎登車語百姓曰：“我攝政王也，太子隨後至，爾輩許我為主否？”眾皆愕眙不能解，姑應之曰諾。眾或稱為英宗之後，百姓惶惑無措。於是攝政遂入朝。<sup>41</sup>

此記錄意指北京百姓誤將清軍當作明軍而錯迎。《再生紀略》載：

初三日，喧傳太子將至，諸叛臣及刑辱未死諸臣，俱爭先郊迎。凡病傷及翦髮者，靡不勉襲冠帶，或背負以出。比太子至，則辮髮虬鬚，虜中所謂“九王子”也，百官失色。<sup>42</sup>

這一處記錄則認為官員誤認為是明太子至而迎接。《甲申核真略》亦持此說：

初三日，諸臣俱赴朝哭臨……余禮畢，有傳駱錦衣鹵簿出迎。至朝陽門外，易輿之際，知其非東宮也，諸臣乃有駭愕而退者。余聞之，不敢東。未及旋寓，而城上之白標滿矣。<sup>43</sup>

而《謏聞續筆》則載：

至初三日，見吳公舊役夏姓者，馳而來曰：“大喜！我公破賊，借清兵送太子至矣。”眾聞之，踴躍往迎，至東長安門，見大清示，心知有變。同行者嘲予曰：“腐儒，彼不難借兵破賊，復予明辟，而不容其出示耶？”予終不敢以為然。至鑾駕庫，見大金吾駱養性，及恭順勳衛吳惟華騎而前導，數十騎吹角跳躍，有出肩輿而乘板輿者，非太子也。遂復驚遯。<sup>44</sup>

這一記述明示民眾在清軍到達之前，已知道即將入京的是清軍。朝鮮《瀋館錄》載：

辰時清兵進迫城東五里許。都民處處屯聚，以迎軍兵，或持名帖來呈者有之，或門外瓶花焚香以迎者亦有之矣……都人盛陳儀仗諸具以迎。<sup>45</sup>

此書亦寫市民既知來者為清軍而相迎。

在此，湯若望記述了一條重要的命令：作為鞏固新政權的措施的一部分，新王朝劃分了北京城內各地區的功能，並將湯若望時居的地域劃為滿人所有，要求滿人之外的漢人居民在三天內遷往外城。<sup>46</sup> 在此時，湯若望再次為了

保存耶穌會的財產而努力：為了保住耶穌會的房產，他向一名清方官員聲明了他的傳教士身份以及在天文算學上所取得的成就。<sup>47</sup> 這一聲明不但使耶穌會的房產得以保全，也構成了湯若望日後受到清廷青睞的契機。關於這一道遷居的命令，中文記載中也有印證。《謏聞續筆》載：

十一下令移城，以南北二城與居民，而盡圈中、東、西三城為營地。京師侯門大宅盡在中三城，南則城外關廟，北則後湖一帶，皆勳戚宦寺、花園別墅，及僧寺菜圃耳。限期既迫，婦子驚惶，扶老攜幼，無可棲止。<sup>48</sup>

《甲申核真略》記載亦同：

（五月）十一日……時虜將駐兵中、東、西三城，督居民移出。自是縉紳雜出，概不致詰。<sup>49</sup>

《再生紀略》所記命令內容與《謏聞續筆》《甲申核真略》一致，還提及清軍提前佔據民房使百姓失所：

（五月）初十日下令：“凡在京百姓，限十日內俱移南北兩城。其東、西、中三城，俱住達兵。”不料三日內，達兵不待遷徙，遽佔民房，民之失業者甚眾。<sup>50</sup>

一份順治元年十月的詔書曾提及不同區域官民的免稅令，其中說到“其東、中、西三城官民已經遷徙者……其南、北二城雖未遷徙……”也可佐證此前曾要求東、中、西三城居民遷徙，而南、北二城原定居民留居。1648年的另一份詔書則在前令的基礎上進一步要求“北城及中東西三城，居住官民商賈，遷移南城”。<sup>51</sup> 從上下文所指的時間而言，湯若望記述的應為1644年農曆五月的第一次遷居指令。湯若望當時所居住的聖母無染原罪堂（即北京南堂）位於宣武門內，確屬1644年要求遷居之列。<sup>52</sup> 魏特在《湯若望傳》中稱教堂在北城，

清軍入京後要求湯若望與當地漢族居民一併遷往南城，這應是混淆了1644年與1648年的兩次遷居指令。<sup>53</sup>

根據書中的記載，在遷居命令下保護耶穌會財產是湯若望與新政權的第一次正式接觸，也是他意識到自己及教會的事業有可能在新帝國取得更高成就的重要原因。湯若望捕捉到新朝的態度：清廷並不因其外國人的血統與耶穌會士的身份而加以輕視，反之，正因他並非漢族，新晉的征服者給予他更高的禮遇。此外，湯若望還強調了清廷在執行手續上的效率與嚴格的態度：在短短一天之內，湯若望保留房產的申請通過了檢查與批准，並得到有效的執行。這一份申請在保護他所處的教會房屋之外，還進一步庇護了其他會士的財產。<sup>54</sup>

在清王朝嘗試重新修曆以聲明自己政權的正統性時，湯若望再度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在比較了回回曆、大統曆以及湯若望的西洋新法之後，湯若望以最高的準確度勝出，並在清朝名聲大震。<sup>55</sup> 1644年年底，清廷任命湯若望掌管欽天監印務，湯若望再三推辭，但未得准許，最終他接受了這項任命，成為新政權中的一名正式成員。<sup>56</sup>

### 三、湯若望評價政權的三個維度

筆者整理了《歷史敘述》對大明、大順、大清三個政權的記載。湯若望的記錄與評價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個主題。

#### （一）軍政表現

作為混亂時期北京天主教徒的庇護者，湯若望與三個政權的軍政官員都有過一定的交流。

湯若望對大順政權的負面描述，集中於其混亂的軍政管理體系。大順政權的終結原因至今仍存在爭議，本文無意就此展開。無論如何解釋李自成的失敗，無可否認的是，在大順軍

## 傳教佈道

隊進入北京之初，確實曾一度建立威信，籠絡起相當數量的投降官員。<sup>57</sup> 可惜的是，這一和諧局面僅維持了極短暫的時間，新政權還來不及建立名譽便迅速破滅。清軍南下入關，大順政權退出北京。對比遠在江南的衛匡國仔細區分大順軍隊中的不同勢力、重點批判李自成因暴力而錯失建立統一新政權的可能性，湯若望關於大順軍隊的記錄以其進京、離京前後的暴行為主，其反感的態度在書中表現得更為堅決和直接。<sup>58</sup>

湯若望主要記載的大順軍隊暴行集中於進京與離京兩段，而中文記載亦以此兩段時間為重。如《燕都日記》載：

十九日平明……賊殺傷官民何啻數萬，溝渠坑塹血肉皆滿，民間亦多有乘機報怨者，偽權將軍出令安民，禁擅殺，間有梟示，竟不能止；縛去養馬燒火者無算。至夜，淫縱尤甚，諸賊將挾妓招童，歡呼達旦，稍忤其意者立死。

廿九日……城上賊兵暫輟，城外賊兵亦進京索賞，是夜，淫污劫殺更甚於前，民間老婦稚女，罕得免者。意以迎敵故，縱之也。<sup>59</sup>

《遇變紀略》載：

市民語予曰：“賊兵搶刑部衙門，書吏妻女投井者無算，智井為之滿；院門皆內局，不敢啟……”

五鼓，賊發大隊出齊化門去，猶留賊兵萬餘守九門，內外縱火：各賊兵寓宅火盡發，烈焰衝天。<sup>60</sup>

《甲申紀聞》載：

二十五日……賊將各踞巨室，藉沒子女為樂；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馬搜銅為名，沿門淫掠。稍違言，兵在其頸……

二十三日……行二日，忽有令箭至，焚毀城外民舍。

三十日，守者亦盡焚宮殿而去。<sup>61</sup>

但在《甲申核真略》中，楊士聰在記錄了一則擄掠民女暴行後說：“此李賊兵敗入城，軍紀不行，兩日來淫掠之大較也。若二十六日以前，則絕無此等。”<sup>62</sup> 可見，楊士聰認為在兵敗之前的大順軍紀尚可。

衛匡國和魯日滿都在書中記錄了清廷在建立政權之初的混亂治安，以及對未來傳教環境的消極預期；而湯若望則不同，在他的筆下，滿人對北京的統治有極為良好的開端——滿人迅速打敗大順軍隊，穩定北京局勢，受到北京市民的歡迎。<sup>63</sup> 參考同時期的文人筆記，《謏聞續筆》所記的入城清軍極有秩序：

清人來居其中，見我人甚有禮，曰：“中華佛國也，我輩來作踐佛地，罪過罪過。”踰數日，復召西達三千來助城守，皆弋弓束矢，負而上城，日恐驚百姓也。<sup>64</sup>

《定思小紀》也有清軍初入北京時令行禁止的記載：“從兵甚寡，於道旁埋鍋而爨，無輒入民家者，民或往觀，弗之禁。”<sup>65</sup> 《遇變紀略》對當時清廷的記載為：

設施新政，無非解網弛禁，期與臣民更始；故朝野一時歡然服從，如大旱之得時雨也……是月中旬，長安市上仍復冠蓋如故矣。<sup>66</sup>

在這些筆記中，清軍甫入北京時的形象皆以正面為主，如前文提及清軍違令佔據民房的《再生紀略》，也有記載稱清軍當時紀律極嚴，“殺一人者，十人償之；殺一犬者，一人償之；犯淫者誅無赦”。<sup>67</sup>

此後，湯若望與清朝官員為保護教內財產



進行的交流更直接地體現出新王朝統治者的高效與公正，這也與湯若望在前文記載的明朝普通辦事官員的行為形成了對比。湯若望長期參與明廷的火炮鑄造工程，其在書中對此多有記敘：在一年之前，由於被賦予了鑄造大炮的使命，湯若望曾與大量宦官共事。其間，湯若望在原料、勞動力等具體事務上多次受到同事者的惡意刁難，進度一再受阻。<sup>68</sup> 同時，他付出大量心血的天文治曆工作，也因其他官員的嫉妒與謠言而陷入停滯。<sup>69</sup> 湯若望認為，明廷內部的勾心鬥角使這些官員已無暇顧及這一政權的真正利益，因此他當時已對明帝國的未來深感悲觀。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年後作為新晉勝利者的清朝官員對他以禮相待，其中尤以范文程對其影響最大。作為清初重臣，范文程態度和藹，關注湯若望的學識與天文工作，幫助他以合法的方式保護耶穌會的財產。<sup>70</sup> 即使是對天主教、天文學不甚了解者，也忠誠地遵循了來自上級的命令。<sup>71</sup> 在對三個政權的軍事與行政能力描寫之中，湯若望對清廷的評價最為積極。

## （二）對外態度

湯若望以自身天文算學知識在中國立足，因此他對自己的知識能否受到重視分外敏感。在筆記中，湯若望用大量筆墨記錄了他在朝廷工作的感受。除去因時間過短而未建立起完整政府機構的大順政權，湯若望在明清兩朝都因其西學造詣受到統治者與高級官員們重用。<sup>72</sup> 在湯若望的記載中，與重視其技能但始終心存芥蒂的明廷相比，清初官員的交流態度更加開放和平等。在明朝，除少數奉教士人與其僑流外，多數官員與湯若望的交流僅限於具體的職責工作，較少涉及思想與知識層面的討論。湯若望認為，自己在明廷中所受到的質疑及推行新曆過程中受到的阻礙，大多出於文官與宦官對漢家身份與固有儒家傳統的高度自傲，這種封閉的態度使湯氏倍感失望，也影響了他在明廷中的工作——他不得不反覆向崇禎帝證明自己的可靠，甚至直到明朝滅亡，凝聚湯若望等

人心血的新法都未能正式推行。<sup>73</sup>

雖然身在南方的魯日滿尖銳地批評了新統治者對知識的鄙夷，但在北京的湯若望的記錄中，西學在新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清廷聽從他改良曆法與欽天監工作的建議，對他施以正式的表彰，並主動向他提供欽天監的職位。<sup>74</sup> 在這樣的環境中，湯若望建立起較前朝更為廣博的交友網絡：他自泰西而來，掌握天文算學等先進知識，在關外時期便效力於清廷的官僚向他表示善意；湯若望先事明朝、又事清朝，故而與龔鼎孳、胡世安、王崇簡等同樣有改換門庭經歷的貳臣也有密切來往。<sup>75</sup> 在清廷中，官員們頻繁地與他交談、通信，讚美他在天文學上取得的成就，讚揚他主持編修的新曆法。在頌詞與往來詩文中，他們坦蕩地列舉中國舊有曆法的局限性，讚美湯若望新的計算方式。除了與湯若望進行天文學上的交流之外，他們也樂於獲取關於泰西文明、天主信仰的知識，將之視為視野的有益拓展。<sup>76</sup>

其中，徐元文讚揚了湯若望來華的行為，肯定了他的知識、信仰與工作，將他視作官員們應該效仿的對象。<sup>77</sup> 作為朱熹新儒學倡導者之一的魏裔介大膽地在文中談論儒學與天主教在信仰上的共同點，“主教尊天，儒教亦尊天，主教窮理，儒教亦窮理”，<sup>78</sup> 更將二者作為通向人類至聖的道路相提並論。清代官僚與知識分子的開放、尊重，為湯若望描繪了充滿希望的未來圖景，推動了身為西來傳教士的他融入到清代的精英階層。

除此之外，清廷與朝鮮頻繁的政治文化往來也使湯若望獲得擴大影響力的新契機。在清軍入京後，湯若望結識了入清為質、暫住紫禁城文淵閣的朝鮮昭顯世子，並使後者對西學與天主教義產生興趣，進而計劃在朝鮮加以推廣。<sup>79</sup> 自昭顯世子開始，赴清的朝鮮使者也多與湯若望有所接觸，他們將湯若望視為先進技術知識與文化理念的傳播者。<sup>80</sup> 湯若望藉由清廷，得以與中國之外的王室與官僚接觸，進一步擴大西學與天主教的傳播。



## 傳教佈道

### （三）宣教可能

湯若望曾直截了當地評價崇禎帝的優點在於他對天主教的讚揚與鼓勵。<sup>81</sup>然而，皇帝的偏重並未貫徹於王朝的整體意志之中，也未真正對湯若望在帝國中樞的傳教活動產生幫助，反之卻成為阻力來源之一。明政權內部的君主與官員之間的立場分裂出現於諸多傳教士的敘述之中。衛匡國記載了萬曆帝為保護傳教士與官員們進行的鬥爭，這場政治鬥爭最終以萬曆帝失敗、傳教士被權力機構驅逐而告終。衛匡國認為這場失敗的鬥爭是明廷整體對天主教搖擺態度的縮影，並認為這埋下了帝國被天主懲罰、走向崩潰的禍根。<sup>82</sup>魯日滿詳細記述了南明永曆皇帝和奉教太監龐天壽之間的權力、信仰之爭。<sup>83</sup>甚至遠在南美的教士帕萊福，也在他根據在華教士來往信件寫成的作品《韃靼征服中國史》中，記錄了明廷官員對崇禎帝命令的陽奉陰違和明廷對外國人與宗教活動的高度忌憚。<sup>84</sup>作為服務於中央朝廷的西來傳教者，湯若望被直接捲入皇帝與官員的矛盾之中，他在王朝統治者及官僚的重用、提防與控制中，小心地保持着明廷任務與自身宗教身份的平衡。大量的世俗工作與傳教事業上相對有限的進展，再加上來自部分教友與明廷同事者的誤解、質疑與攻訐，為湯氏帶來相當大的精神壓力，令他幾度計劃放棄世俗事務，以求純粹地為傳教工作。<sup>85</sup>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湯若望筆下，清初的中央朝廷有更強的控制能力與辦事效率，清初的官員們也更為開放和包容，為傳教事業的未來發展構架起良好的基礎。儘管湯若望在書中並未留下此時他與清朝官員直接討論傳教的記錄，但在日常往來交流之中，尤其是范文程仔細詢問湯若望在明朝所擔任的官職與工作內容、天主教的相關知識時，新征服者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已表露出來。<sup>86</sup>湯若望敏銳地捕捉到清朝官員對西學與天主教的探求欲，並決心利用這一優勢鞏固自己的地位，從而在傳教方面取得比明朝更高的成就。

綜上所述，湯若望因李自成及其軍隊的暴行而反對大順的統治。在統治階級的素質、對待外來新事物的態度及宗教觀這三個層面上，他都給予清廷更多的正面評價。由此，湯若望在筆記中給出了他選擇效力於清廷的最詳盡的解釋。

### 四、傳教策略的反思與身份難題

關乎一國運轉或一人存身的現實因素眾多，而此書在記敘之中格外重視以上三個層面。若要對此作進一步討論，則要考慮到此書生成與出版的背景，並往上追溯到湯若望遠赴中國的初衷。

早在1616年，尚在羅馬學院學習的湯若望就決定要前往中國傳教。他決心在數理科學上取得一定的成績，並以此復現利瑪竇（Matteo Ricci）與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遠東取得的成功。<sup>87</sup>當湯若望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之後，正如他曾經預期的一般，其科學造詣使他迅速建立起個人威望，並在短短十餘年間得到了崇禎帝的歡心，有效推進了教會的發展。<sup>88</sup>

然而，在個人能力越發受到明廷重視的情況下，湯若望發現日漸繁重的世俗職務已經開始不可避免地與傳教任務發生衝突。這一矛盾不僅存在於時間與精力的分配上，更存在於朝廷顧問與傳教士這兩種身份之間。他原本是為了增加社會影響力、便於傳教而為明廷工作，然而若要進一步融入明廷官員群體，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減少自身“立異”的宗教色彩，這無疑背離了他的初衷。但如果湯若望放棄為明廷工作，耶穌會的活動即會因為失去庇護者而受到直接的影響，甚至他與教友的個人安全也可能失去保障。

在這種矛盾的心理之下，湯若望對自己所繼承的“文化適應”策略進行了全方面的反思與權衡。所謂“文化適應”策略，與當時流行的歐洲化傳教精神大相逕庭，相關的種種辯論

更持續至今，其表現為：在華傳教士放棄本國的語言，積極融入異國文明與政治，利用在世俗世界取得的成就來反哺精神世界信仰的成功。<sup>89</sup> 明帝國有成熟且與歐洲、非洲迥異的文化體系，以及與這一文化體系同樣發達的孤立主義精神與純然自給自足的政治實體。<sup>90</sup> 利瑪竇等人的經驗反覆向湯若望申明，這一方法是傳教士在中國得以生存、得以開展工作的必要條件：傳教士如果放棄了科學技術這一媒介，很有可能失去他們在明帝國眼中的最大價值。

這種使宗教附庸於世俗體系之中的做法，促使湯若望兢兢業業地為明廷服務。然而，在他為這個帝國工作的二十餘年之中，湯若望始終未能成功勸化帝國的最高統治者。隨着明廷內部臣臣之間、君臣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湯若望清楚地意識到政治身份給傳教事業帶來的阻力；同時，他又無法承擔放棄政治身份、中斷傳教士在華一切事業的風險。因此，若要堅持這一傳教方式、維護在華既已取得的成就，湯氏必須承擔這種身份衝突帶來的痛苦，在保守的官僚、封閉的對外態度以及對天主教的排斥下繼續自己的工作，以期未來能夠收獲理想的碩果。

恰在此時，明朝與大順的滅亡帶給了湯若望新的思考。戰亂與傳教士的大量南逃使耶穌會在華北打下的基礎幾近崩塌，也讓湯若望看到了改旗易幟、重起爐灶的希望。他認為明王朝的覆滅是神聖的示警，警告他們此前傳教策略的失敗，他決定以此為契機，放棄曆法與天文的工作，不再試圖在朝廷中謀取地位，一心一意奉獻於傳教事業。<sup>91</sup>

然而，“上主的預警並不止於此”。在大順軍隊決定退出北京之前，叛軍放火焚燒了城中的大量民房，耶穌會的住宅也被牽連其中。在這場火災中，保存記載天文算術相關資料的木板在火焰下出乎意料地得以保全，竟一字也未被焚毀。<sup>92</sup> 湯若望在記錄中將這安然無恙的易燃物稱為“奇跡”，強調這是天主的最終提

示，告訴耶穌會士繼續之前的工作——要擺脫利瑪竇傳教方式所帶來的矛盾，除了改變傳教策略這一辦法外，還可通過傳教環境的變化來實現。明朝的滅亡與清朝的初興，無疑正是一個傳教環境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機。湯若望最終選擇“順應指示”，繼續堅持這一策略，為新的朝廷效力。

如本文開篇曾聲明的，《歷史敘述》中的敘述時間線截止於順治帝去世的1661年，此書在四年後經歐洲耶穌會許可在維也納出版。耶穌會士在獻給哈布斯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的前言中，讚美了湯若望在東方以世俗生活反哺傳教工作所取得的成就。<sup>93</sup> 關於此書寫作與出版的原因，可以從當時耶穌會在歐洲出版的另一部中國作品中窺見一二。1650年，耶穌會因為在中國採取適應中國禮儀的傳教策略而備受非議，在華耶穌會士為此派出代表衛匡國赴歐為其辯護。在返回羅馬的途中，衛匡國開始籌備在歐洲出版關於中國的作品，為這場辯論作輿論準備。<sup>94</sup> 衛匡國出版的作品包括同樣詳細描寫明清易代過程的中國歷史作品《韃靼戰紀》，此書於1654年出版了第一個拉丁文版本，並在歐洲大獲成功，為耶穌會的適應策略贏得了眾多支持，也吸引了大量傳教士申請前往中國教區。<sup>95</sup> 1657年，衛匡國踏上歸途——他完成了在華耶穌會交給他的兩項使命：促使教皇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認可耶穌會對中國禮儀的處理方式；招募更多的傳教士以解決戰爭所加劇的中國教區人手不足的問題。湯若望是在華耶穌會中最早知道衛匡國成功的人員之一。衛匡國與在歐洲招募的第一批傳教士抵達廣州時，正是湯若望將此消息轉呈順治帝，令衛匡國一行人得到許可，順利北上。<sup>96</sup> 作為耶穌會在清廷中世俗職務最高、與清廷統治者最接近、貫徹這一策略最徹底而飽受爭議者，湯若望有理由關心衛匡國如何為自己與教友們所堅持的策略辯護，他由衛匡國《韃靼戰紀》的成功而想到自己的筆記，由此決定將其整理出版成書，讓在華耶穌會持續在歐洲產生影響，讓適應性策略持續在歐洲獲得支持，這是極為可能的。

## 傳教佈道

除了為在華耶穌會辯護外，湯若望整理出版此書的另一動機，可能是對他面臨的種種爭議作出含蓄的回應。如前所述，湯若望在華期間參與了大量與傳教不存在直接關係的朝廷工作，且與教外人士多有往來，這些行為在教會內也頗受質疑。關於湯若望在中國參與明清兩朝工作、接受清廷官職等行為動機的質疑，令其不堪其擾。<sup>97</sup> 湯若望通過整理出版這一作品，自陳經歷與心路，既是從明清鼎革親歷者的視角描述這一變遷與維護在華耶穌會的策略，也是從北方耶穌會在明清鼎革之中一系列選擇的當事者的角度，向同會修士與歐洲其他讀者作出解釋——他支持清廷，是為了傳教事業的發展。

1648年，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而告終，這一條約包含了許多宗教方面的內容，締約者試圖維護神聖羅馬帝國內部政治秩序與宗教秩序之間的平衡，建立起“統一”的秩序，這可能便是耶穌會士們將《歷史敘述》的前言獻給利奧波德一世的原因。<sup>98</sup> 無論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是否會因此書對天主教在東方的延伸產生興趣，耶穌會士們對此書的期望已然表現出來：他們認可湯若望的工作，認為他的作品將會對顯揚耶穌會傳教策略與成就發揮積極的作用，他們也希望這本書能使耶穌會在中國的事業獲得長期而穩定的歐洲支持。

上文所提及湯若望在《歷史敘述》評價三個政權時所看重的三個因素，恰恰是明末時期“文化適應”策略動搖時，阻礙耶穌會士傳教的三個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他認為清廷擁有開放的新官僚、包容的對外態度、對天主教教義的好奇與尊重。在湯若望筆下，存在於明帝國的舊障礙已被新的王朝除去，他為朝廷工作與傳教士身份之間的衝突以這種戲劇性的方式暫時得以消弭。湯若望此書看似是記錄明清更迭的歷史，實際上這些描寫都為在華的北方耶穌會的選擇作出鋪墊——《歷史敘述》的作品核心在於以湯若望為首的耶穌會會士在朝代變遷之中致力於維護教會與傳教事業發展的事跡。

以上的三個因素固然有其現實相關性，但無不與傳教事業未來的發展緊密相連。從前文即可知，與其說湯若望等人倒向清廷是因為其強大的控制力，不如說是因為清廷所帶來的在傳教事業上取得巨大突破的可能。《歷史敘述》不僅是湯若望對耶穌會在中國既往挫折與成就的總結，更進一步蘊含着耶穌會士對傳教事業在中國光明未來的預言。這部出版於歐洲的作品是為遠東的傳教藍圖擂鼓吶喊。

此外，此書更向歐洲展示了對傳教事業無比忠誠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的形象，間接回應教會內外對湯若望的諸多質疑：在本書的描寫中，湯若望願意為了推動傳教工作而放棄世俗的成就，經受世俗的非議；即使在他本人的事業陷入停滯之時，他也努力為其他教徒、教士提供幫助與庇護，不懼任何生命危險；當新的帝國為其指示新的可能時，他依舊為了傳教而作出選擇，而非忠於某個確切的政權或是某位具體的統治者。《歷史敘述》所呈現的這一形象正如湯若望在〈主教緣起總論〉中所寫的：

雖繇是獲謗招尤，一切不顧，繇是推知予為天主行教，其殫精盡瘁，守正不阿，以求無負本學，有必不敢後者矣。<sup>99</sup>

## 結語

本文通過解讀湯若望在《歷史敘述》中的明清鼎革書寫，解釋隱藏在該書背後的湯若望的寫作心理與自我認知，以及當時歐洲耶穌會對湯若望在華工作的態度。萬曆年間，利瑪竇所制定的“文化適應”傳教策略，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這種合理性在本質上是為了達致傳教的目的而作出讓步的結果。只要東方文明對外來文明的排斥與天主教文明使東方文明皈依的願望仍然存在，兩種文明的衝突就不能真正避免。湯若望在明末所面臨的在華政治身份與歐洲傳教士身份之間的矛盾，是當時傳教士群體困境的縮影。這一矛盾在清代初期以改朝換代的方式得以暫時消解，但卻始終存在於他們的傳教事業之中。而湯若



望所開啟的以科學家身份服務於清廷統治者，進而獲得發展傳教事業庇護的“效忠—庇護”模式，看似解決了傳教士在中國的居留問題，但也意味着傳教士群體的生存極大依賴於皇權對於西學的興趣。他們的傳教工作因而需要讓步於朝廷工作，且不得不耗費大量時間來維持其與統治階級的關係。同時，統治階級的態度一旦發生變化，受其庇護的傳教士所展開的傳教事業將受到極大打擊。<sup>100</sup> 隨着湯若望等傳教士進入清廷並在政權中取得越來越高的地位，兩種文明之間的矛盾在康熙五年（1666年）前所未有地集中爆發，幾乎將湯若望乃至中國的傳教事業置於死地。其後的禁教風波，也進一步證實耶穌會士們的這一策略確實潛藏隱患。從另一角度來說，湯若望等傳教士所作出的選擇符合當時中國傳教事業的實際需求：從清軍入京到康熙曆獄之前，天主教在中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歷史敘述》力圖說服歐洲讀者相信的藍圖一度成真。<sup>101</sup> 正如1665年此書的前言所說，在中國的事業並未令人失望。<sup>102</sup> 即使是親身經歷康熙曆獄的傳教士殷鐸澤，他在寫作中依舊肯定了湯若望在清廷的崇高地位為在華傳教士與其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sup>103</sup>

湯若望筆下的明清鼎革敘事的背後，記錄的是他在朝代更替之中試圖為教會謀求最大利益的過程。不可否認，湯若望從明朝顧問到清朝官員的身份轉變是建立在朝代鼎革的種種衝突與矛盾之上，具有明顯的現實性因素，但結合其表述與相關紀年研究可以看出，這種現實性因素也與其對於傳教事業的熱忱相連，並非只為世俗官僚身份或現實生存壓力所綁架。湯若望以明清鼎革的大背景為基礎，結合自身經歷與修會面臨的現實問題，作出傳教事業的新規劃，體現出歷史轉折、朝代更迭中的人物活動的複雜性。而湯若望回憶作品所經歷的編輯、整理過程，也呈現出歐洲耶穌會強調湯若望忠誠傳教士的身份，以及掩蓋其在明清兩朝世俗政治角色的努力。《歷史敘述》所塑造的以傳教使命為先的湯若望個人與在華耶穌會形象，既有其現實依據，也與當時修會內外的爭議密切相關。

註釋：

1. 本文所選取的湯若望筆記為湯若望於1665年出版的 *Historica Narratio, De Initio et Progressu Missionis Societatis Jesu Apud Chineses, Ac Præsertim in Regia Pequinensi, Ex Litteris R. P. Joannis Adami Schall, Ex Eadem Societate, Supremi ac Regii Mathematicum Tribunalis Ibidem Præsidis*，簡作 *Historica Narratio*，中文譯為《歷史敘述》，李雪濤對該書德譯版的部分內容作了整理。參見李雪濤：《誤解的對話：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頁65-78。
2. (美)魏若望著，辛岩譯，(奧)雷立柏校：〈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國際漢學》，第2期（2004），頁132-133。
3. 對湯若望進行生平經歷梳理的主要著作有1933年德國魏特神父出版的《湯若望傳》（*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J. P. Bachem）；1936年，約瑟夫·杜爾在此書的基礎上撰寫了湯若望的法語傳記《耶穌會士在中國：天文學家和帝國顧問湯若望（1592—1666）》（*Un Jésuite en Chine: Adam Schall, Astronome et Conseiller Impérial (1592-1666)*. L'Édition Universelle）；1963年，雷切爾·亞得沃得（Rachel Attwater）在前書的基礎上再次改編出版湯若望的英語傳記《湯若望：中國耶穌會士（1592—1666）》（*Adam Schall: A Jesuit at the Court of China, 1592-1666*. Bruce Publishing）；1991年，德國中國中心在保留1933年《湯若望傳》的內容上新增了參考索引與湯若望家譜，並重新出版此書。此外，還有1980年恩斯特·斯托莫（Ernst Stümer）的《“通玄教師”湯若望》（*Meister Himmlischer Geheimnisse*. Verlag St. Gabriel）、1995年李蘭琴的《湯若望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李天綱的《紅頂戴·白鶴服·西方教士第一人：湯若望在中國的日子》（台北：光啟文化）。湯若望在明清兩朝的日常工作、人際交往等社會活動也受到學界關注，主要以論文形式呈現，如（美）夏伯嘉：〈從安文思與湯若望之間的恩怨論說明宮廷耶穌會士〉，《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3期（2017），頁116-122；王臻：〈朝鮮世子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在北京的交往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2期（2015），頁137-142；吳元豐：〈湯若望為赴琉球天文官事滿漢文題本考析〉，《滿語研究》，第1期（2020），頁69-76；馬偉華：〈順治年間湯若望



## 傳教佈道

- 管理欽天監事務探蹟》，《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第4期（2012），頁73–77。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改變中國：在中國的西方顧問》（*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中對此也有所探究。對湯若望作品的考察目前已相當豐富，如肖清和：〈辯護與疏離：湯若望與《主教緣起》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2017），頁131–150；韓琦：〈明末清初歐洲占星術著作的流傳及其影響——以湯若望的《天文實用》為中心〉，《中國科技史雜誌》，第34卷第4期（2013），頁433–442；褚龍飛：〈明版《治曆緣起》新探〉，《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3期（2017），頁63–74；Jost, Alexander. "Beyond Agricola: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European Knowledge in Adam Schall Von Bell's Chinese Mining and Metallurgy Handbook Kunyu Gezhi (1640)."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5, no. 1, pp. 58–89. 這些研究皆指出了湯若望在引介西學時的務實主義立場。在研究者論及明末清初各傳教士的政權立場時，湯若望往往會被視為支持清廷的重要人物，奈傑爾·卡梅倫（Nigel Cameron）博士在《野蠻人與文明人：西方旅行者在中國的十三個世紀》（*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lers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中的介紹即是如此，魯保祿（Paul Rule）教授在〈耶穌會與明清鼎革：卜彌格與衛匡國如何站在對立面？〉（"The Jesuits and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ow Did Boym and Martini Find Themselves on Opposite Sides?" *Monumenta Serica*, vol. 59, no. 1, pp. 243–258）一文中對湯若望支持清廷的原因及其對耶穌會和南方傳教士的影響的分析也極具代表性。
4. 肖清和：〈“三面”湯若望：湯若望的身份困境與歷史書寫〉，《基督教研究》，第1期（2021），頁324–326。
  5.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p. 358–359.
  6.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19–320。
  7.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 358.
  8.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 359.
  9.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 359.
  10. Duhr, Joseph, and Alfons Vāth. *Un Jésuite en Chine: Adam Schall, Astronome et Conseiller Impérial (1592–1666)*. L'Édition Universelle; Desclée de Brouwer, 1936, pp. 10–11.
  11.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 359.
  12. 1672年拉丁文版全名為 *Historica Relatio de Ortu et Progressu Fidei Orthodoxæ in Regno Chinensi per Missionarios Societatis Jesu Ab anno 1581, Usque ad Annum 1669, Novissimè Collecta ex Literis Eorundem Patrum Societatis Jesu Præcipuè R. P. Joannis Adami Schall Coloniensis ex Eadem Societate. Editio Altera & Aucta, Geographicâ 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ne; 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 Statu Missionis Chinensis; Prodigiiis, Quæ in Ultima Persecutione Contigerunt; & Indice*，簡作 *Historica Relatio*。
  13.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and Prospero Intorcetta. *Historica Relatio*. Typis Augusti Hanckwitz, 1672, p. 353.
  14.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79、181。
  15. 參見李雪濤：《誤解的對話：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
  16.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 359.
  17. 德語譯本全名為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ission unter der Leitung des Pater Johann Adam Schall, Priester au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dem Lateinischen Übersetzt und mit Anmerkungen Begleitet*。法語譯本全名為 *Lettres et Mémoires d'Adam Schall, S. J.: Relation Historique, Texte Latin avec Traduction Française du P. Paul Bornet., S. J.*。該書書名在〈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中被辛岩譯作《湯若望書信集和回憶錄，歷史的敘述，拉

- 丁文原文和 P. Paul Bornet., S. J. 的法文譯文》，參見（美）魏若望著，辛岩譯，（奧）雷立柏校：〈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國際漢學》，第 2 期（2004），頁 140-143。
18.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Vorwort.
  19. （不詳）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滄州：獻縣勝世堂，1923 年，頁 205-206；（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251；（法）榮振華著，耿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735。關於萬密克之死，一說其死於李自成軍隊的直接劫掠，一說其死於城破後的混亂中。
  20. Dunne, George Harold.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320-321.
  21.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59-62.
  22.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62.
  23.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63-64.
  24.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62.
  25.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63-64.
  26.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58-59.
  27.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65.
  28.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順治元年五月至六月，《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57。
  29. [明] 談遷撰，張宗祥校點：《國榷》卷 100，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頁 6057-6058。
  30. [清]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 20〈廿一得先帝遺魄〉，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464。
  31. [明]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收入 [明] 楊士聰等：《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20-21。
  32. [清]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 445〈卓行（三）〉，轉引自白岫：〈崇禎葬事錄〉，《紫禁城》，第 1 期（2000），頁 32-34。
  33. 《韃靼戰紀》1654 年首版全名為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in quâ, quo pacto Tartari hac nostrâ aetate Sinicum Imperium invaserint, ac ferè totum occuparint, narratur: eorum `que mores breviter describuntur*，簡作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此書於 1661 年重修，並改名為 *Regni Sinensis a Tartaris Devastati Enarratio*；2008 年，此書與魯日滿、帕萊福的中國史作品被合併出版了中文譯版，該版本中文譯名為《韃靼戰紀》。參見 Martini, Martino.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pud Iohannem Ianssonium Juniorem, 1655, p. 72。
  34.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68-69, 75-82.
  35.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65-66.
  36.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72-73.
  37.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73.
  38. Rougemont, François de.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Typis Martini Hullegaerde, 1673, p. 2; Palafox y Mendoza, Juan de.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Acosta de Antonio Bertier, 1670, pp. 177-179. 魯日滿此作中文譯名為《韃靼中國史》，拉丁文原文於 1668 年寫成，1672 年率先出版葡萄牙文版，次年出版拉丁文版，拉丁文原文名為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1672 年的葡萄牙文譯名為 *Relaçam do Estado Politico e Espiritual do Imperio da China, Pellos annos de 1659 até o de 1666*；《韃靼征服中國史》西班牙文原名為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法文名為 *Histoire des Conquêtes*

## 傳教佈道

- des Tartares*，西語原版與法譯版一同於 1670 年出版，1671 年法文版被翻譯為英文，英文版名為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Several Remarkable Things, Concerning the Religion, Manners, and Customes of Both Nations, But Especially the Latter*。
39.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4–5, 73.
  40.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83.
  41. [明] 劉尚友：《定思小紀》，收入 [明] 楊士聰等：《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74。
  42. [明] 陳濟生：《再生紀略（下）》，載 [明]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 5，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42–343。
  43. [明]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收入 [明] 楊士聰等：《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38。
  44. [明] 明遺民：《諛聞續筆（上）》卷 1，上海：進步書局，刊年不詳，頁 8b。
  45. (朝鮮) 不著撰人：《瀋館錄》卷 7，收入金毓黻輯：《遼海叢書》第 8 集，瀋陽：遼海書社，1985 年，影印本，頁 15b。
  46.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85.
  47.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85–87;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8 年，頁 216–217。根據魏若望在〈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中的分析，這名官員即范文程。
  48. [明] 明遺民：《諛聞續筆（上）》卷 1，上海：進步書局，刊年不詳，頁 9a。
  49. [明]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收入 [明] 楊士聰等：《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41。
  50. [明] 陳濟生：《再生紀略（下）》，載 [明]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 5，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46。
  51. 《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9，順治元年八月，《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95；《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41，順治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清實錄》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30。
  52. 關於清初北京格局的劃分，可參考劉洋、張鳳梧：〈清初八旗制度對北京城市宮苑格局的影響〉，《建築史》，第 1 期（2021），頁 114–124。
  53. Vā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p. 146–147.
  54.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87–88.
  55.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88–91；《滿文密本檔》卷 152，頁 267，轉引自安雙成：〈湯若望在華傳教之得與失〉，《歷史檔案》，第 3 期（1996），頁 82。
  56. 肖清和：〈“三面”湯若望：湯若望的身份困境與歷史書寫〉，《基督宗教研究》，第 1 期（2021），頁 330；黃一農：〈湯若望與清初西曆之正統化〉，收入吳嘉麗、葉鴻瀾主編：《新編中國科技史：演講文稿選輯》，台北：銀禾文化事業公司，1990 年，頁 475–476。
  57. 顧誠：《南明史》，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 年，頁 4–5。
  58.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65–69, 75–82; Martini, Martino.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pud Iohannem Ianssonium Junioem, 1655, pp. 92–94, 183–191.
  59. [明] 無名氏：《燕都日記》，載 [明]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 6，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60–364、376。
  60. [明] 聾道人：《遇變紀略》，收入《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6 輯，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87 年，頁 8。
  61. [明] 馮夢龍：《甲申紀事》卷 1〈甲申紀聞〉，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50–53、59。
  62. [明]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收入 [明] 楊士聰等：《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36。

63.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84; Martini, Martino.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pud Iohannem Ianssonium Juniorem, 1655, pp.153–154, 172; Rougemont, François de.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Typis Martini Hullegaerde, 1673, pp. 49–50, 67.
64. [明] 明遺民：《設聞續筆（上）》卷 1，上海：進步書局，刊年不詳，頁 8b。
65. [明] 劉尚友：《定思小紀》，收入 [明] 楊士聰等：《甲申核真略（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74–75。
66. [明] 聶道人：《遇變紀略》，收入《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6 輯，台北：台灣大通書局，1987 年，頁 11。
67. [明] 陳濟生：《再生紀略（下）》，載 [明]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 5，收入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第 1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344。
68.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52–53, 60.
69.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55; Dunne, George Harold.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 318. 當時的反教者常攻擊傳教士所引介的西方天文學與傳教士改進的曆算方法，《聖朝破邪集》收錄了大量此類文獻，關於湯若望及西方天文學在明廷所面對的具體障礙，可參見湯若望的《學曆小辯》及《明史·志第七·曆一》。相關專著可參見馬偉華：《曆法、宗教與皇權：明清之際中西曆法之爭再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相關論文可參見石雲里：〈崇禎改曆過程中的中西之爭〉，《傳統文化與現代》，第 26 期（1996），頁 62–70；肖清和：〈科學或者迷信：清初中國曆書之爭〉，《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1 期（2021），頁 77–89。
70.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86–87; (美) 魏若望著，辛岩譯，(奧) 雷立柏校：〈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國際漢學》，第 2 期（2004），頁 139。
71.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87–88.
72. 關於湯若望於明末、清初朝中所受榮典之殊異，可參見黃一農：〈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中國文化》，第 7 期（1992），頁 160–170。
73.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39, 43–49, 57.
74. Rougemont, François de.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Typis Martini Hullegaerde, 1673, pp. 191–202. 對此的中文記載可參考《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5 “順治元年甲申壬午”條、《清史稿·列傳五十九·湯若望》。
75. 關於湯若望在清初與貳臣群體的交往，可參見肖清和：〈辯護與疏離：湯若望與《主教緣起》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 5 期（2017），頁 136–139（第二節“‘宸遊多暇’：湯若望的人際網絡”）；紀建勳：〈李日華和霍叔瑾兩人題贈傳教士詩歌研究——兼論《贈言》所涉清初貳臣與西學西教間的互動〉，《基督教學術》，第 1 期（2012），頁 220–243；黃一農：〈王鐸書贈湯若望詩翰研究：兼論清初貳臣與耶穌會士的交往〉，《故宮學術季刊》，第 12 卷第 1 期（1994），頁 1–30；孫麗華：〈湯若望在華人際關係探析〉，碩士論文，華南師範大學，2007 年；等等。
76. (美) 魏若望著，辛岩譯，(奧) 雷立柏校：〈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國際漢學》，第 2 期（2004），頁 140–143。
77. (美) 魏若望著，辛岩譯，(奧) 雷立柏校：〈湯若望和明清之際的變遷〉，《國際漢學》，第 2 期（2004），頁 140–143。
78. [清] 魏裔介：〈魏文毅公賀湯若望七表壽文〉，收入（德）湯若望：《主制群徵》卷 2，天津：大公報館，1915 年，頁 66。
79. 王臻：〈朝鮮世子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在北京的交往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2 期（2015），頁 138–140。
80. 王臻：〈朝鮮世子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在北京的交往考述〉，《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2 期（2015），頁 140–142。
81.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63–64. 關於崇禎帝對天主教的態度，可參見王啟元：〈徘徊於菩薩與耶穌之間——崇禎宮廷信仰變遷及其影響〉，《國際比較文學》，第 4 期（2021），



## 傳教佈道

- 頁 699–713。
82. Martini, Martino.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Apud Iohannem Ianssonium Junioem, 1655, pp. 34–36.
  83. Rougemont, François de.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Typis Martini Hullegerde, 1673, pp. 171–179.
  84. Palafox y Mendoza, Juan de.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 Acosta de Antonio Bertier, 1670, pp. 10–11, 14–15, 270.
  85.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55, 80; (不詳)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滄州：獻縣勝世堂，1923年，頁 190–191。
  86.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p. 87–88.
  87. Vâ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 30.
  88.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 169–171；Vâth, Alfons, and Louis van Hee.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ein Lebens- und Zeitbild*. Steyler Verlag, 1991, pp. 118–132.
  89. Dunne, George Harold.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12–13.
  90. Dunne, George Harold.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pp. 10–11.
  91.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80.
  92.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80.
  93.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4.
  94. Chen, Min-sun. "Thre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and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1, pp. 140–141.
  95. Chen, Min-sun. "Thre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and the Manchu Conquest of China."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1, pp. 140–141;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8–122.
  96.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 308；(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 261–263。
  97. 關於湯若望在教會內所面臨的爭議與這些爭議所帶來的影響，可參見(美) 夏伯嘉：〈從安文思與湯若望之間的恩怨論說明宮廷耶穌會士〉，《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 3 期 (2017)，頁 116–122；金國平、吳志良：〈湯若望私生活之爭議考〉，《學術研究》，第 9 期 (2004)，頁 94–100；(德) 魏特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
  98. 王銀宏：〈宗教爭端的世俗衍化和政治表達——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與神聖羅馬帝國的秩序建構〉，《史學月刊》，第 7 期 (2021)，頁 105。
  99. (德) 湯若望：〈主教緣起總論〉，《主教緣起》，法國國家圖書館藏，BnF Courant chinois 6937，頁 12a–b，轉引自肖清和：〈辯護與疏離：湯若望與《主教緣起》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第 5 期 (2017)，頁 136。
  100. 肖清和：〈“三面”湯若望：湯若望的身份困境與歷史書寫〉，《基督宗教研究》，第 1 期 (2021)，頁 323–324、331、335。
  101.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38年，頁 237；(意) 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頁 67–68。
  102.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Historica Narratio*. Typis Matthaei Cosmerovij; Sacrae Caesareae Majestatis Aulae typographi, 1665, p. 4.
  103. Schall von Bell, Johann Adam and Prospero Intorcetta. *Historica Relatio*. Typis Augusti Hanckwitz, 1672, pp. 356–357.